



林兴宅 陈家春

文化转基因： 从和而不同说起

一、“和”的内涵——中西观念形态的差异

林兴宅（以下简称“林”）：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文化转换中，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它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方法论等诸多层面。我想，我们可以先由“和而不同”谈起。

“和而不同”最早出于《论语·子路第十三》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孔子从伦理观来谈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是具有道德智力的人，能够处理异质的东西，处理不同的利益关系和不同的个性。他既坚守自己的理念，又协调各种观念，尊重他人，因此“和而不同”。小人道德智力低下，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结盟，但必然会为了利益而发生矛盾冲突，因此“同而不和”。

陈家春（以下简称“陈”）：“和”在今天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经常说“和谐社会”、“和睦”、“和平”等，都包含了一个“和”字。但“和”的古意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存在认识的偏差？因此，要清楚地认识“和”

字的内涵，就需要联系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对“和”字的理解。《国语·郑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这强调的是一个“异质”，异质的东西多元共生才构成世界，才构成人生。在“和”中，更多的是异质的东西掺和在一起，其中有矛盾，有撞击，这样世界才能绵延发展。正如《郑语》所说，如果都是同质的东西，就组合不成一个世界，更何谈发展。

林：“和而不同”最早是孔子提出的，但“和”的概念出现得更早，就是你提到的《国语·郑语》所说的，接着还有一段话是：“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姦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3]

我们中国讲阴阳五行，五行相克相生，生成万物，五味协调满足人的口味，音律要六种音符才有悦耳的音乐。我们应该超越伦理范畴来理解“和”。“和”是中国式的智慧，是对自然和历史的认识。世界本来就是纷繁复杂、多样统一的，不强求一致性，不强求整齐划一。“和”就是对自然历史本然状态的认识和概括。“和”这一概念的内涵就是尊重差异，追求和谐。

陈：是的，由“和”引发的是“同”与“异”的问题。深入一步想，其实基于人类的生物本能与进化的需要，求同与求异两种倾向在个体生命及整体人群中，始终是存在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两种倾向或并重或消长，或呈现各不相同的形态，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东西方的观念显出极大的差异。

以中国的历史来看，除几段分立分治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有晚清至民国初年，社会为纷纭的求异思潮提供了温床以外，更长的时间里，求同倾向总是占居主位。即使是所谓的汉唐盛世，居上位者也总想以大一统思维来统摄天下。上个世纪下半叶，更是有

一个一元化走向极端的阶段。所以，就整体而言，千百年历史大致不离对大同的追求。

西方情况则大不相同。以西方文明的起点古希腊历史来看，尽管出现过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这种求同倾向明显的思想。但也不要忘记，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的生命哲学也早已存在。从学派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求异乃求同之母。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求同曾一度占了上风，形成黑暗的中世纪，乃至有中世纪神权压制异端之种种所为。但自文艺复兴以来，求同与求异两种倾向大致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其中，基督教掌控求同思潮，将民众由此岸的竞逐引领到彼岸的追寻，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开出民主化、多元化的异彩。

二、传统的迷思与痼疾

林：对，中西情况的确不同。孔子的“和而不同”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和”，偏离了《国语》的原意。我们要超越伦理学，把“和”看成中国式的智慧，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思考“和”与“同”。

陈：在古代，“和”是包括自然、历史、社会、人生综合一体的原初状态，有“同”和“异”两个方面。但是在历史长河中，“和”慢慢地演变成只追求一个“同”。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就有“大同世界”的描述。大同理念，其实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渐渐地，中国的“大同”思想偏离了原初的意思，特别是汉朝以后，一味只强调“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把“大同”变成了大一统。“大同”类似宗教追求的乌托邦，比如宗教中基督教的天

堂、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追求彼岸的幸福美好，实际作用是平衡现实的种种不足。但是如果把这种彼岸的乌托邦与政治上保守僵化的大一统观念混在一起，就完全背离了本意，往往成为统治者用来欺骗民众的工具，以表层的倡“同”达致本质的专治。

林：你说得不错，在古老中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都有定于一尊的儒家儒教，它追求法治上的“大同”世界，而排斥异质。

陈：孔夫子及其后人对“异”有很大的误导。我们看，关于“异”的词语搭配大概有几类：一种中性的，比如异地，异域，异性，异乡，异国，表示不同的意思；另一种带有贬义的词语，比如：异端，异动，异己，异类，异族。这表现了中国人对“异”质的排斥、反感甚至恐惧，因此要“党同伐异”；还有一类褒义的“异”，比较多体现在民间词汇里，比如异人，异禀等。但是在政治层面，就是排斥“异己”、“异端”。

林：是啊，国人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充分表现出中国人对异己的恐惧和排斥的心理倾向。

陈：但是西方的民主政体，从普选制度到舆论监督，从多党制到三权分立，从四大自由到完善法制，无一不是确保异己力量的合法存在和功能的发挥。所谓分权制衡，说到底便是以“异”制“异”，用《国语》的说法就是“以他平他”。就拿理念来说，西方的普世价值中，故有求同之义，但中间仍有自由与平等两端，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于此各自交叉发展。再看人际关系的处理，西方社会向来倡导沟通、对话，寻

求共识，透过谈判妥协，达致双赢共生，而不是单边操作压制对方。这或可称为求同存异、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承认并尊重对方之“异”，因而也可说是求异存同。

在现代西方，天主教、基督教走的是大同之途，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则是大行异道。这种近乎分途同归的状况，正是西方文明发展到极致的表现。西人流行一句箴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正是最好的注脚。

林：从你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容忍“异”，而社会观却只强调“同”。大一统的思想是旧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可以追溯至秦甚至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分离的。第二，中国文化观念中，有求“同”的思潮，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化追求，同时也有求“异”的思潮，正如前面《郑语》所说的“以他平他”之意。这两种思潮本该同时存在。但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传承中没有强调一个“异”字，没有鼓励去求“异”创新。求“异”是普世价值，中国在古代就有求“异”的文化，只是在历史长河里，我们偏离了“异”，只注重了“同”。

陈：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让我们接触了西学，这对我们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力量仍是微弱的。我们要考虑怎样构成一个多元共生的状态。

在西方，宗教以外的社会生活中，求异的倾向总是占主导地位。从观念形态到制度构建，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处处都存在异质、异思、异行。从理念说，个体本位、自由价值始终占主导，思想界、学术界

尊崇自由法则，文学艺术创作更是鼓励个人的创造，经济方面的自由经济理论，始终占主导。在主流的社会结构中，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也总会异军突起发挥作用。

西方在长期的历史中，摸索出一套成功的价值观，西方文明更追求在相克中找出相生共存，通过沟通，达成尽可能地求“同”。中国却缺乏这样的精神。现在我们要回到原初是很难的，但想要达到双赢，我们就必须作出改变。

林：这其实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观有一些类似之处。

陈：马克思的对立统一中强调异质元素相克的一面，而相生的相对较少。因为相克，所以要彻底消灭另外的一面。马克思将这个对立统一用于社会，就是一个阶级要彻底推翻另一个阶级，要暴力革命。斗争与专政是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可见，马克思的对立统一，与中国上古的“和”的概念还是存在差别的。

三、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林：我们承认世界上的物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我们在处理方法上却是求“同”，这实际上是政治社会学的偏离。它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始终都在追求“同”，追求一样，而不善于处理差异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看到强势的人，就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另外，我们总是不善于尊重他人的个性。而在情感上，我们缺乏宽容，倾向于独断专行。我们总是坚持一元化的价值观，机械划一的思维方式，总是排斥异己，总是独断专横。这些都是我们文化

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和而不同”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智慧，要将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提倡。

陈：对，如果思维方式上改变了，那么人能处理好自身的问题，就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乃至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

林：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和而不同”就是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又要尊重别人的个性。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也要承认和尊重他人的个性，来寻求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情感方面，我们对待他人应该是包容的，而不是对抗的。

从价值观念来说，我们不主张一元的价值观，而是多元的，多元就要求我们通过对话来达到共识。

从精神境界来说，“和而不同”要超越利益的纷争，要追求心灵的和谐。

作为思维方法，“和而不同”就要求保持系统思维的动态平衡，这就不可能是静态的思维，不可能是断裂的思维。

陈：你讲的思维的动态平衡，很对。因为在“和”中，存在着异质的不断激荡，世界本就没有静态，我们只有在动态中尽量取得平衡。

林：我们不能容忍异质的东西，实际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和”是把世界看成对立统一和谐共生的整体，“同”的观念是把世界看成整齐划一的机械整体。它们表现在个体行为方式上，“和”就是兼容并包，“同”就是专横霸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和”就是宪政民主制度，“同”就是专制独裁制度；表现在经济领域，“和”就是市场经济，“同”

就是计划经济。

从方法论来说，“和”就是系统思维方法，“同”是矛盾对立的思维方法。黑格尔曾经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的同一”（“知性的同一”），即“脱离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是“包含多样性和差异于自身的同一”。^[4]消灭一切差别，排除一切差别的同一就是“同”，包含着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和”。所以黑格尔认为：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我们就只能承认它为最无用和最无聊的工作。^[5]所以我认为黑格尔的话和我们中国的“和”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国哲学界，曾经有一场很著名的争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

陈：“合二为一”是六十年代初，由杨献珍最先提出来的。

林：这场论争其实是关乎“同”与“和”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是以通过吃掉对方，消灭异己的方法来达到“同”；“合二为一”是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的方法来达到“和”。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从哲学的认识论角度来说，“和”与“同”是两种文化观念的不同；第二层，这两种世界观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特别表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第三层，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在对“同”“异”的区分中得到启发。

陈：抽象的求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客观事物所组成的整个大千世界，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比如说

全球化问题吧，全球化始于上世纪的经济一体化，到了九十年代，可以说风靡全球，本世纪初的全面网络化，世界范围内的人流、物流、资讯交流达到巅峰。拿欧洲来说，从经济的一体化到政治的整合，十年欧盟给人带来人类大同的希望

我们也可把全球化看成是当今人类求同、趋同的努力和实践，从动机来说，不能不说它是美善的，也确实取得相当的成果。这二三十年来，各国的物质生产极大提升，民众生活也如此，可以说，大家都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然而，现在问题来了，全球性的资源消耗，生态失衡，贫富悬殊，种族冲突，还有金融危机，粮荒水荒等等，天堂般的欧洲骤然颓败，内外交困，迅猛发展的亚洲也麻烦多多，领土争端，区域性局部冲突不断。

林：是的，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呢？

陈：原因很多，其中一点便是全球化的趋势来得太快，人们求同、求富心切，但却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国的政经文化乃至生活形态千差万别，如何调适、整合，如何在尊重各自独特性的前提下，去寻求一体化？其实各国的领袖精英们，包括民众，并没有真正准备好。你看，一方面，是人、物、脑的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另一方面，为区区领土你争我夺，为什么就不能妥协合作、共同开发呢？既然跨国公司无远弗届，我可以收购你的大公司，我可以当我的企业大股东，你可以在我的腹地大搞投资，我也可以用钱买你的小岛，为何还要争个你死我活

都是十九世纪的概念和思维，这不是落伍的作为吗？

林：是的，这些看似很矛盾的

现象，是与过于求大同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对，表面上是各自坚持自家的独立意志，实质上是人们盲目追求一体和不同，没有充分顾及各自的独立性，作出适度的分离、切割，而造成的后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大锅饭以至于大饥荒，不就是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造成的吗？而今欧洲发生的饥饿穷困现象，其实也是与过度的族群混合和过度福利主义分不开的。一个叫人费解的事，是当着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和黑格尔的统一论几近要成功时，崩解骤然出现了，这是不是又一次证明“大同”的理念始终不能在人类社会开花结果？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不瞒你说，当我准备为欧盟默哀时，深心却为这个理想国致敬再三。

林：你关注的是全球化的问题，我关注的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和文化的转型。我们的政治制度尽管不同于以前的专制时代，但仍然是一种集权主义。如果我们不改变，就可能如邓小平同志曾警告过的那样，可能亡党亡国。尽管我们的领导也一直在呼吁要改革，但如何改革却是一个问题。

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要改变制度，首先要改变观念，改变大一统的思维方式，突破原本思想观念上的制约。如果我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对政治制度的不满仍然只是停留在利益的争夺上。现在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关注者，大多只是精英阶层，只有精英关注更深层次的东西，而普通百姓关注的始终是利益。我们如何改变这个局面，让所有人都注意到

改革问题的重要性？

陈：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民众只是从利益层面来考虑，也不尽然。要说利益，近二三十年来，全社会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知识精英们，不也是立足于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来考虑的吗？只不过他们不是直接生产者，他们是知识生产者。这些年，普通民众也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一种觉悟。只不过他们力量比较分散，加之水准参差不齐，无法形成系统的改革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能认清自身的问题，就能提高的很快。相反，许多知识精英可能考虑问题会更趋保守，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群体里的一部分，更容易受利益的支配。

林：你说的对，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我们文化人可能做的就是推动文化的转型，讨论如何挖掘古人的思想资源，把“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智慧落实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

四、文化转型 挑战与重塑

陈：我经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比较缺少容忍异质的思想因素。从孔夫子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种排除异质的文化，这是我们文化DNA。一些知识精英就曾对文化转型问题提出过看法。比如阳光卫视的董事长陈平先生就曾提出民族的“转基因”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问题是如何转？

林：我非常认同文化转基因这一说。但是要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我认为，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所希望的渐进改革，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作为文人，我认为这些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陈：我个人主张还是要渐进式

的改革与改良，不要革命，不要流血，还是要走理性的非暴力的改革道路。但是，这不等于以渐进的改革作为借口，来拖延甚至不去改革。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消极地对待，让人希望又彻底失望，那就错失改革的良机了。其实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基因工作，也是渐进改革的一部分。

林：值得我们讨论的是怎么来进行文化转基因。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缺失。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的现代性因素，真正能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是十分匮乏的。但不是完全没有，而是稀缺资源，我们文化人能做的就是去挖掘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金子。比如我们的个人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责任意识等等都是比较匮乏的，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发现挖掘，用来作为现代文化转型的思想资源。

陈：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春秋以前还是有很多优质的东西，比如道家的老子庄子，他们所提倡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保育环境，无为而治，是有很高的智慧的，又比如墨家的“兼爱”与“非攻”，。墨家的主张其实与现代普世价值也有接近之处。“非攻”是和平主义非暴力，“兼爱”相当于“博爱”，但是可惜这些思想主张都被儒家压制了。古代这些非常好的东西，完全可以融入今天的普世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把这些好的东西挖掘出来。

现在有一批人，一听到普世价值，就觉得那是西方的。既然是普世，那就不论东方西方，从古至今都适合的，它并不是西方专有，只不过西方500年的发展使它形成了系统的、完善的观念形态。而我们

缺失了，就需要去寻找学习，并嫁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来。我们可以学习西方，也可以从我们中国的道家，墨家等传统文化中寻找，但在嫁接时，一定要注意区别研究。

林：制度和观念是相匹配的，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政治家的事，我们文化人所能做的就是进行跟改革政治制度相匹配的文化批判。但是现在，我们的很多文人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时候，大概是两种倾向：一种是一味地歌颂传统文化，复古，回归，把传统文化不加区别地给予美化；第二种是把传统文化庸俗化，用市侩的语言描述，恶搞传统文化。这两种研究倾向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研究。

我们应该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使它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促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这是我们能做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和而不同”，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中国式智慧。而这个智慧埋藏在传统文化的一堆沙土中，要加以挖掘，让人知道这是传统文化中的金子，对人产生一种启发作用。我们要找出那些传统文化中能与现代普世价值对接的东西。甚至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也许比西方还早，这些就应该找出来。

陈：对，但是传统文化中一些与普世价值对立的，相悖的，我们就应该认真批判。另外，我们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比如个体本位、生命价值，没有的就不要硬去找，就应该正视，老实承认，转而去认真学习他人的。

林：文化“转基因”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三类：一类是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元素；一类是我们文化中没的，

就应该学习和借用西方；还有一类是反普世价值的，就应该认真批判。

在政治改革和文化转型的操作层面上，我持悲观态度。因为，制度就像一部车，是有惯性的，突然转方向很困难。这种惯性是非常难以改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基础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自耕农这种生产方式差不多已经都没有了，农民逐步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社会转型的力量已经存在。既然生产方式变化了，我们的制度也要相应变化。

一个社会的转型有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现在，制度变化的硬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制度的惯性是软件，又非常难改变。如果我们软件不具备，即使硬件具备了，我们的转型也不会彻底，甚至可能会制造新的混乱。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还是比较关注在文化转基因中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找出这样的一些资源，今天拿出来分析，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整理：贺文慧）

（作者单位：林兴宅，厦门大学；陈家春，为香港公开大学特邀嘉宾讲者）

[1]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子路第十三》[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2] 左丘明：《国语·郑语》[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页。

[3] 左丘明：《国语·郑语》[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页至516页。

[4] 张世英编著：《黑格尔 小逻辑 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5] 黑格尔著 黄昀、常培育译：《小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401页